



读《红楼》品自己的人生

□梅莉



读完闫红的《在〈红楼梦〉里读懂中国》一书,作家要言他人所未言,自圆其说的同时,若还能启迪他人,就是好书。又想起以前看闫红解读过《红楼》,显然,中年的她与年轻时的想法有很大不同。

很正常,我重读一本书时,也会随着年龄与心境的改变而改变,多出一些悲悯之心。我大概是在初中时读《红楼梦》的,那时就当一部爱情小说看。自然希望林黛玉与贾宝玉终成眷属,尽管最后是“白茫茫大地真干净”。我反复阅读的肯定是贾宝玉与林妹妹嬉戏、吵架、试探的部分,并且非常不喜薛宝钗。

谁知中年的我却不再喜欢林黛玉的性格,转而欣赏薛宝钗。因为我不希望林妹妹像个敏感的脆皮文艺青年,这样她就不至于17岁就泪尽而亡。宝钗因早早顿悟世事无常,反而放得下,她是可以长寿的,很多红学考证宝钗活到九十岁。

中年闫红解读《红楼梦》,更多试图去理解小人物的不易与“众生皆苦”的慈悲。比如,她写活在底层的荣国府穷亲戚贾芸,为谋份差事,先是求错了人,找到没有实权的贾琏,事情自然没办成。转头再去找王熙凤,他告诉自己不能太着急,急迫地求人,矮的就不只是三分了。“大多数人都不想帮助匍匐在地上的,低眉折腰,也有个限度”。最后虽终于如愿以偿,心路过程却“不亚于一场征伐”。

作者说贾芸是另一个版本的刘姥姥。没错,任何一个在底层的小人物,求人办事时,都经过深思熟虑、万般考量,他们没有更多的生存资源,只能眼巴巴地期盼那些手里有资源的人能分一杯羹。巧的是,这样的贾芸暗恋的对象正是伶牙俐齿、思路清爽的丫鬟小红,小红赢得王熙凤赏识,被提拔为“总裁助理”。他俩如果真如脂批里暗示的结为夫妻,小日子肯定过得蓬蓬勃勃,都是身在底层却积极谋求出路的聪明人,志同道合,目光一致。

于是,闫红感叹:“不管是给人倒茶,还是一起喝茶,作用都是有限的,人想出人头地,还是要靠自己,靠自己的能力。”可不,想起自己某次自不量力的糗事,问一个自觉关系还不错的作家朋友能否推荐一些出书编辑的信息,他一口回绝:不能。我顿时咽住了,半晌回不过神。后来,我想明白了,没有金刚钻想揽瓷器活,高估了自己,难怪人家拒绝。

闫红看红楼,擅长从人性出发对比解读。比如王熙凤一向心狠手辣,做过不少坏事,间接杀人,涉及几桩命案。但她处在权力的巅峰得意忘形,说从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,“凭是什么事,我说要行就行”。就这样一个狂妄到目无神明的人,只因做了母亲,也会为儿女体弱多病而犯愁,还恭敬地请乡下粗鄙之人刘姥姥给女儿起名字,说“你贫苦人起个名字,只怕压得住他”。

刘姥姥问及这孩子的生辰,凤姐说,七月初七生日,日子不好呢。因为“七”这个数字可能常常与民间做大事有关,诸如“头七”之类。但此时的凤姐忽然又迷信了不是。与之前全无信仰的她岂不自相矛盾?闫红说:“原因很简单,此刻,她是一个母亲。人一旦有所深爱,常常会呈现出某种跟素来表现脱节的非理性。”“唯有所爱者,是我们的软肋,让我们变得胆怯、弱小,在太平盛世里也觉得危机四伏,恍若间草木皆兵却无处着力,唯有敬畏上天,敬畏苦难。”这一段,做母亲的都懂。也正因凤姐对刘姥姥的宽容与接济,成为她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善举之一,才真正庇护了女儿巧姐。

书中也因此赞扬了被父亲深爱过的凤姐,对女儿的爱比丈夫强烈。爱是可以传承,但遗憾的是,爱并没有把凤姐变成一个善良而美好的人。

说红楼不可能不把林黛玉与薛宝钗作比较,闫红说当年也是“拥林”派。现在她的看法有所改变,认为宝钗的“无情”其实是一种对弱者的保护,她无差别地对别人好,做朋友不适合,但因为作为拥有资源的管理者,就非常公正。“给弱者也留一份,那是每个人的后路,内心最深处的安全感之所在。”作者将自己放在弱者的位置上,共情小丫鬟、赵姨娘这种弱势群体,她们得到宝钗的礼物后会有很多开心。

没错,宝钗有钱,有钱人不见得个个都大方,小气得多了去。记得当时我看潘向黎老师的《人间红楼》一书,觉得她解读得别具一格,唯一不太同意她说宝钗情感淡薄,像个“中央空调”的说法。因为我认为宝钗冰雪聪明过早参悟,似乎没有青年时期而是直接步入中年,她的博爱是对整个人类的悲悯。

在闫红的解读中,我看到对宝钗的肯定,说宝钗善于分配:“让弱小者获得哪怕是有限的利益共享,能够让所有人都活得更加安全”。

所以,我说过,读红楼,其实品的是自己人生。正如闫红所说,我们当下的痛点与焦点,《红楼梦》里都有。



人在《她乡》

□陈慧



《她乡》这个书名是赵子源定下的。

我与赵子源相识于2021年11月。其时,他供职于天津人民出版社,做得最畅销的一本书是和果麦文化合作的陈年喜老师的《微尘》,销量达到了十六七万册。

赵子源找我,也是抱着做书的想法。很显然,他高估了我。在写作这一块,我是半吊子加野路子,只写得了自己感兴趣的,或真正触动我的东西,根本达不到为出版而奋斗疾书的境界。其次,我和我儿子的日常开销一直靠摆摊卖货的收入支撑着。不出摊,就意味着没有进账。尽管定居浙江后我从未沦落到揭不开锅的地步,但一天摸不到钱,一天心发慌。草民的生计大于天。我不可能,也没有条件,摆下菜市场的营生,坐在家里专职码字。

赵子源说,三姐,出书的事咱们不急,你按照惯常的节奏慢慢写,我慢慢等。

他这一等,就是两年。

2022年,由于新冠疫情的蔓延,导致我和慈溪蜂农夫妻早早约好的远行计划搁浅了。一个做了周详的准备,决意离开,却被迫困于原地的人,何其的郁闷!那种情绪的落差,不亚于从沸点降至冰点。整整一年,我如坐针毡,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劲儿。好在,我的担忧是多余的。2023年,封控全线解禁,蜂农终于可以自由活动了。

赵子源知道我四月初将追随蜂农夫妻向北远游,说要来浙江与我碰个头。年轻人的话,我不会太当真。没想到,赵子源真的在3月21日的傍晚分分赶来我居住的浙江小镇。那是我们的首次碰面,他看好我部署了一年多的追花逐蜜之旅,但我拒绝了他递出的橄榄枝。一方面是在他之前,我的第一任编辑苗梁捷预先来排了队,我也作出了口头允诺。另一方面,在旁人眼里,我义无反顾地挣脱了原来的轨迹,投身到一个完全陌生的行业中,貌似很勇敢很有魄力的样子。事实上,我的底气严重不足。蜂农辗转四方,离群索居,以简易帐篷容身,我一个没有了点野外生活经验,体质不够硬朗的菜鸟能不能坚持走完全程,真不好夸口。万一中途挨不了苦,灰溜溜当逃兵了呢。丢脸没什么,不能如约交稿就麻烦了。比起悬在半空中的一纸合约,我更倾向先落实到行动中去。倘是顺利成文了,于情于理,我都该把书稿交到苗梁捷的手上。

赵子源对我的决定表示理解。买卖不成,仁义在。赵子源返程前,对我说,三姐,蜂农这个题材目前刚起步,先放一边儿,你看咱们是不是能换个思路,合作一本别的书。

我说,写文章这件事在我的日常排序中,是位于摆摊和睡午觉之后,属于有时间就做,没时间就不搞的“副业”。毕竟我不是真正的作家,没有半数以上的文稿,我不敢答应任何人。

赵子源笑了,三姐,我也是半路出家,大学里学的专业和文字编辑挨不上边儿,咱俩是不正宗对不正宗。

2023年7月,赵子源二度邀请我签约,他说他已在我既往的文章中选出了契合主题的五万字。正常的一本书,总字数数十万到十二万,余下的部分,我从蜂场回家后,边摆摊边补写,哪怕到了规定的交稿时间,没有完成,也可以适当延期。

对方如此通情达理,我似乎没有理由不配合。那会儿,我依附蜂农夫妻落脚在辽宁朝阳北票河营乡的荆条花场里。由于驻地是很多当地人白天也不敢涉足的老坟场,没有具体位置,我只能通过微信选了就近的学校。快成书前,《她乡》的走向又拐了个弯儿。李佳骐来通知我,三姐,我们要和果麦合作这本书了。

传统出版社和文化公司携手,于作者而言,利大于弊。对原先组稿的编辑来讲,无疑是白忙活一场。果麦的编辑王奇奇调整角度,换掉了之前李佳骐选中的半数文章,定稿后呈现出来的《她乡》变成了一帧乡镇女性的群像。

王奇奇曾说过,人有人命,书有书命。

《她乡》,在我正式上市的五本书里,最是一波三折。就像我们这漫漫的,带着遗憾的一生里,有的人,注定是来助力我们的成长,有的人,注定供我们想念,有的人,注定与我们相守。

感谢经过我生命中的每一个你!



《大战场》

余戈

天地出版社

敌后战场的开辟,奠定了中国抗战两个战场的战略格局,为迅速扭转战争初期的不利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作者深入晋冀豫鲁等敌后战场战役战斗发生地寻访调研,结合中外史料互证,重现了真实的敌后战场。本书在相当程度上填补了军战史专业研究的空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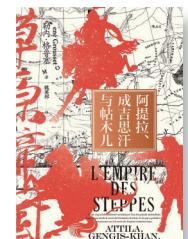


《长命》

刘亮程

译林出版社

《长命》植根于作家的生命印记之中,诞生于祖先与子孙血脉相连、记忆相承的生命谱系之中。一个村庄从“有神”走向“无神”,一个人理解了自己的“浅命”与“长命”。我们站在祖先与子孙之间,被时间延续成长命,上下皆是生命前行的路,这是生命永远的路。



《阿提拉、成吉思汗与帖木儿》

[法]勒内·格鲁塞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世界文明史中的伟大成就大多发生于欧亚大陆的边缘,而在这片广袤大陆的中间,则是与文明割裂的野蛮之地。阿提拉、成吉思汗与帖木儿……这些来自这片土地的名字至今仍在文明史的阴暗面回荡。草原人民为世界历史带来的是否只有灾难与毁灭?



《事物的起源》

[德]尤里乌斯·E·利普斯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利普斯注意到,人类文化早期发明者的贡献既引起当代大众广泛的好奇心,也是世界大同的引路标之一。因此,全书包罗衣食住行、风俗习惯、生产方式、社会制度等贴近日常生活的主要,同时伴有许多深入浅出的思索,可谓一本简明而意蕴深远的人类启示录。

烟火里的坚守与温柔

——读陈慧散文集《她乡》

□季健

作为如皋人,能与老乡陈慧相识十多年,见证她从菜场摊位走向文学舞台,更看着她远嫁浙江后在异乡打拼、笔耕不辍,最终被中央电视台、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等主流媒体关注报道,成为备受读者喜爱的作家,是我人生中温暖而珍贵的缘分。

这位用文字温暖人心的业余女作家,曾走过坎坷的人生。她自幼被送养,成年后为了生计,开过裁缝铺,摆过地摊,白天与各种顾客打交道,夜晚还要在疲惫中照料家庭,生活的风霜早早刻在了她的人生轨迹里。可即便如此,她从未向命运低头,那些吃过的苦、受过的累,都成了她笔下最真实的底色。

这些年,我看着她在烟火缭绕的生活里笔耕不辍,从《世间的儿女》《渡你的人再远也会来》到《在菜场,在人间》,从《去有花的地方》再到如今的《她乡》,每一部作品都像她亲手栽种的花,在时光里慢慢绽放,带着泥土的芬芳与生活的温度。六年前,我为她策划《世间的儿女》《在菜场,在人间》的家乡新书首发式时,台下坐满了乡邻与读者。记得当时如皋市新华书店想安排宾馆接待,却被她婉言谢绝:“不用麻烦,我住老家就行。”连一顿饭都坚持不让书店安排,从浙江往返路费她也是自掏腰包,分文报酬未取。今年正月初六,她又专程赶回如皋参加《去有花的地方》读者见面会,我提出派车去接她,她笑着摆摆手,当天直接骑着摩托车准时出现在会场,头盔一摘,眼里闪着熟

悉的真诚光芒。她站在台上,说着熟悉的如皋乡音,那时我便懂,这个在菜场里摸爬滚打的女作家,骨子里藏着最质朴的底色。她从不把自己当“作家”,总说自己是“摆摊的”,可正是这份不端不装的质朴,让她的文字能直抵人心。那份对生活的纯真热爱,像春天里的油菜花,热烈又纯粹。而支撑她从菜场写到文坛的,更是那份骨子里的坚毅,生活的奔波从未消磨她的笔锋,反而让她的文字更有力量。

前几天,收到她寄赠的新书《她乡》,封面是淡蓝色深灰色相间的色块,一如她给人的感觉,温柔却有韧性。翻开书页,熟悉的质朴文字扑面而来,这一次,她将目光投向了“她乡”里的女性,字里行间都是她对女性命运的深切体察,《宋家阿公》里的场景让我尤为动容。她写菜市场里八旬老翁的辱骂,自己像“玻璃灯罩外的一只蛾子”般无措时,九岁的宋家阿公挺身而出护着她。没有华丽的渲染,只用一句“他挡在我面前,像老母鸡护着小鸡”,便让那份市井里的温情跃然纸上。这让我想起她曾经说过,“菜场里的人最真”,原来她早已把这份真写进了骨子里。

书中追花之旅的篇章,延续了《去有花的地方》的自然气息,却多了几分对女性坚韧的描摹。她写东台弶港的十级台风,“帐篷在暴雨里剧烈震颤,像随时会被撕碎的纸”,寥寥数笔便勾勒出追花路上的艰辛;可转头又写风雨过后,“大地静得只剩我和狗,

成年人的孤独,悲喜自渡

□陈凤兰

著名作家刘震云的《一句顶一万句》,初看时是小人物的艰辛坎坷,再看时是人一生最深切的孤独。因了这份孤独,让人有种厚积的沉重感,使我们不断地在《论语》和《圣经》之间徜徉,在与神与人反复拉扯中,桎梏于真正的“百年孤独”。

这部小说分“出延津”和“回延津”上下两部。上部讲了“出延津”:一个叫杨百顺的人,一生似乎都很不顺。他叫过杨百顺后,后来又改成杨西摩、吴摩西,最后还变成了罗长礼……为了谋生,他卖过豆腐,杀过猪,信了教,破过竹,挑过水……几经波折,可上天依然没有眷顾他。直到他出了延津,遇到一个寡妇,才安顿下来。谁知道,寡妇也跟他说不上话,跟别人跑了。为了应付一下找老婆差事,已经化名为“吴摩西”的杨百顺带着养女巧玲上路了,没想到在新乡旅店,他把唯一能跟自己说上话的巧玲给弄丢了。吴摩西跑遍河南各地,没找到养女,却看到了恩爱无比、有说有笑的吴香香与老高,他想杀了他们,可又释怀了,或许他根本就不该跟自己聊不来的吴香香结婚。万念俱灰的吴摩西去了陕西西安,因为那是最后一个有可能巧玲被拐卖的地方。

下部讲的是“回延津”:故事要从曹青娥(巧玲)的儿子牛爱国讲起,也就是杨百顺的外孙。带着母亲(巧玲)临终的遗愿和自己“找不到说得上话的人”的困惑,牛爱国以为

找到外公吴摩西,不但能完成母亲的遗愿,还能解答自己的困惑。可真正找到陕西咸阳时,吴摩西已经去世多年。他得到了外公的遗物:一套教堂设计图。那是当年传教士老詹的遗物,可惜吴摩西没能实现老詹盖教堂的愿景。设计图的背后有两行字,一行是老詹留下的:“恶魔的私语;一行是吴摩西留下的:不杀人,我就放火。牛爱国一脸懵,读者却看到了共性的悲凉,他们都活得不如意。无论是儒家的积极用世,还是天主教的原罪救赎,他们都无法用信仰治好破碎的生活,正如刘震云的另一部作品的名字——“一地鸡毛”。

当我读到第九章的开头时,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熟悉感扑面而来。“杨百顺七十岁的时候想起来,他十九岁那年认识延津天主教神父老詹,是件大事。”这简直就是在向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致敬,那个神开头,一下子把时间与空间扩充成了四个维度。所以刘震云的《一句顶一万句》为中国版的《百年孤独》一点也不为过,更何况他们还表现了相同的主题:人本就生而孤独。

一个人的孤独不算孤独,一个人找另一个人,一句话找另一句话,那才是真正的孤独。我们穷极一生都在寻找一个能说上话的人,知己、朋友、夫妻、同事、圈内人……我们从不同角度不同维度去找一个能听懂我们说话的人,能理解平视我们不怒不杠精的

人。我们似乎在寻找一个“他者”,一个“主”,一个“救赎”。可是这是不可能的,这最多只能是个信仰,现实中却不存在。用心理学上的话来讲,就是当你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时,你就注定失败。

生而孤独并不可怕,无人懂我也并不令人绝望。可怕的是,一切都是荒诞的。这种荒诞就是命运的随机性,事件的偶然性,境遇的无秩序性,周遭的无规则性。我们生而自由,可精神的自由在无序的荒谬世界上,更是一种残忍。《道德经》第五章说:“天地不仁,以万物为刍狗。”人活着,没有囚笼,没有监狱,貌似每一步选择,我们都掌握了主动权。就像杨百顺可以选择自己的名字,自己的谋生手段,甚至是找不到自己的媳妇,但他也没法选择,有一只宿命的大手推着他往前走,往远走,直至死亡。

但我们也不悲观,刘震云结尾告诉了我们活着的样子。宋解放在电话里问牛爱国:

“还没找到庞丽娜和老尚吗?要不回来吧。”牛爱国回答:“不,得找。”其实,牛爱国想找的不是他们俩,他应该去找说得上话的章楚红,这是人对“说得着”的永恒追求。也许这样的寻找最终还是落空,那又有什么关系呢,孤独与寻找本来就是人生常态。

刘震云的《一句顶一万句》,用一句话来概括,就是成年人的孤独,悲喜自渡。这就是每一个“杨百顺”注定的修行。